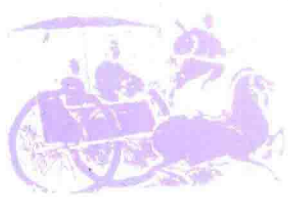


宋代的交通与政治

曹家齐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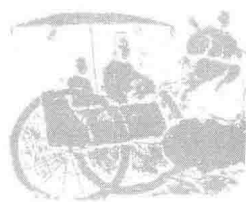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宋代的交通与政治

曹家齐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的交通与政治/曹家齐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7.12
ISBN 978-7-101-12848-2

I.宋… II.曹… III.①交通运输史-中国-宋代-文集
②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国-宋代-文集 IV.①F512.9-53
②D69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2711号

书 名 宋代的交通与政治
著 者 曹家齐
责任编辑 徐真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2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14½ 插页2 字数400千字
印 数 1-2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848-2
定 价 52.00元

自序

对于从事历史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什么是历史、为什么要研究历史、如何研究历史,是经常被问到及需要不断作出解释的问题。而这几个问题,亦正是历史研究认识论中难以回避、不得不阐说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几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却是众说纷纭,仁智各异。

对于什么是历史,尽管解释不一,但历史并非真实的过去,而是对于过去的记录和描述,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若对这一概念作进一步定义,历史归根结底就是记录或描述者(或可称撰写者)站在一定立场上,为着一定的目的,对过去有选择的表述。因此,古今中外便从没有一部史书是对过去进行的公正、客观和完整的记录与描述。对历史作如此定义,似乎会令人丧失对历史之兴趣并怀疑历史研究的价值。然而细想一下即可明白,正因为历史历来如此,历史研究才更具有其魅力和意义。如果历史所记俱为公正、完整、客观之事,则人人皆可凭之了解真实的过去,便不需要所谓历史学家了。正因为历史知识撰述者站在一定立场,为着一定的目的,对过去有选择的表述,而非对过去完整、客观的表达,才需要有人从学术的立场,通过符合学理和专业的方法,剥除重重障碍,去伪存真,帮助人们认识过去。此便是历史学家的职责和存在价值。

既然是认识过去,便会涉及到为什么研究历史的问题。此更是见解不一之问题。古今中外之历史人物各据立场和诉求表达对这一问题之认识,但深具现实关怀的功利意识无不贯彻其中。如中国历史上孔子编《春秋》明是非,是为尊天子,抑诸侯;司马迁撰《史记》,是继孔子《春秋》之作,欲让汉朝据之承弊易变;欧阳修撰《新五代史》是为标举名节,整饬道德;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是为“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梁启超则提出“史学救国”的口号。在西方,现实的功利意识同样亦是对历史学功能的主流诉求。如作为英国大学历史系“史学概论课程”教材的英国当代史家约翰·托什(John Tosh)所著《史学导论》,在谈到历史学功用时,虽不明确给出答案,却仍是把历史学的用途解释为“一个有关各种可能性的清单”,并认为人们不仅可以“从熟悉的历史中获得教益”,还可以在直面痛苦时把历史学“作为疗伤的手段”。当然,在西方亦有极端的观点认为不可能从历史学中获得任何教益,而排斥历史学,这同样亦是立足于现实的功用而讨论研究历史之目的。鉴于对历史学功能认识的多种分歧,学者们力图寻求对此问题最为稳妥、最无可争议的表述。从人们理解现在皆是取决于对过去之认识阐释历史学之功用或即如此。

对历史学之功能表述之异,因于表述者对历史认识之立场和诉求之不同,应是多数人皆能明白之事实。但多数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却往往忽视其中分歧显现最为突出的政治家与“纯粹学者”之不同。政治家最为关注的是现实之利益,为了维护其利益,往往只把历史作为工具,提倡历史学要为现实服务。亦即为了现实利益,对历史进行任意剪裁,选择有利于自己的历史内容,按照符合自己利益的理论模式对历史作出表述、解释评判。“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说,用在此处最为合适。然而,政治家对于历史功能之认识与实践却影响巨大,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和人们的心灵,甚至是很多学者的心灵。不仅兼具政治家、思想家和学者身份的人在表述历史学功能时多从其政治立场和目的出发,许多不具备政治家身份的学者亦往往膺从于政治家的思想诉求,怀着一定的现实政治

目的理解和阐扬历史学之功能。然而,作为一个不具备政治家身份,或不愿俯从于政治目的的“纯粹学人”,对于历史之认识目的,则决然不同于政治家。其对历史之认识,对于历史学功能之理解,是从学理出发,把探求真知作为目的的。近代史学兴起以后表现尤为突出。进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流派表现为新史学、新汉学和新史观派之分野,或多或少体现出政治家立场和“纯粹学者”立场并立、交融之现实。

“纯粹学者”对于研究历史的目的之表述与治学目的一般无二。如明儒陈献章云:“士从事于学,功深力到,华落实存,乃浩然自得,则不知天地之为大,死生之为变,而况于富贵贫贱、功利得丧、屈信予夺之间哉!”陈寅恪先生则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蒂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陈献章虽不以史家名世,然治学意旨却与后世史家陈寅恪俱着落于个人之境界与对真理之认知,而不立于现实之功利。在二人心里,研究历史(治史)即治学,而且都是作为“纯粹学者”表达出治学之鹄的。

研究历史的目的不同,则对如何研究历史的理解亦自然不同。膺从政治家如何研究历史自不必论,“纯粹学者”如何研究历史则甚可绎说。“纯粹学者”研究历史之目的既然在于追求真理,则研究历史是追求真理之途径,历史便只是为追求真理而研究的一个对象。但追求真理并非只有研究历史一个途径。追求真理之理应与“格物致知”之理相同。《大学》里“格物致知”之终极关怀虽仍在于天下、国家,然其学理则可阐说治史与治学。追求真理亦即致知,致知在格物,则是说必须选择一定对象进行研究作为途径。从今之治学角度而言,便是选择一门学问入手。然事实上学问之间并无界限。人之初始,生活简单,亦无文字,知识亦仅限于生活经验,谈不上学问一事。随着人们生活内容的复杂化,文化渐兴,人们的知识亦丰富多样,于是便有了对自然、人文进行探讨的学问。然而学问本为一整体,只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多样化,涵义与容量日增,令人难以尽晓,于是才有了学科划割,治学者亦有了术业分工。如果治学为求真理和“格物致知”相一致,则学者所治之学无不是“格物”之“物”。如此,则无论是

选择治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抑或是人文学科中的史学、文学、哲学诸科,便皆是以格一物入手,殊途而同归。若仅就研究历史而言,亦无人能遍治古今中外历史,只能分成中国史、世界史,以及其中的一个断代史、国别史或专门史。而实际上,具体到每一位历史研究者,大家研究入手问题,亦即所格之“物”,多是断代、国别和专门史中一些具体问题。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治哪门学问,或研究什么历史内容,都是“致知”或追求真理的一个入手门径。

宋代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因历史学学科调整及课程专门化而形成的一个断代中国史研究方向。其研究意旨在于将贯通性的历史横切,细致研究有宋一代或十至十三世纪的中国历史内容。然而,即便是一个断代的历史内容,仍是十分丰富庞杂,宋以后历史尤为如此。一位研究者仍无法涉猎全部,还是只能从某一具体问题入手,亦即仍体现为在认识过程中便形成的学科分工及各自对入手门径之选择。作为勾连人们空间关系的交通问题,亦自然成为研究者探讨整体历史的入门路径之一。然而,即便是一个断代的历史,其内容亦是由时间和空间信息构成的一个整体,其内部结构密切相连,实难完全分割。交通史虽可作为一个研究门径,但其内容实与多项历史相关联。尽管从一开始,史学家们便有整体把握历史的认识初衷,或从某一个人手门径试图对相关历史作纵横之考察,但因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刻认识,亦只能令人徒兴皮毛肤浅之叹。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若干中国交通史通论之作,无不流于这种状况。

新世纪以来,将不同的历史问题联系起来,综合考察,并在方法上实现合理性最大化,是历史研究的新趋势,亦是古代交通史研究的必然选择。所谓将不同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亦即从某一历史问题向其他相互关联的历史问题延伸,对历史问题作综合考虑,以追求对历史的整体观照。就古代交通史研究而言,则是充分体现交通本身的关联性,还交通之本来面目,将之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内容互相连接,整体呈现交通之面貌,真正实现从一个门径尽可能整体认识过去的目标。亦即实现“致知”,

感悟真理。从具体研究而言,不同议题的连接,必然引发对更多史料的解读与利用,其方法的选择自然亦随之多样化。家齐治宋代交通史,正是遵行这一研究理念。在近十余年来的交通史研究中,不断尝试将交通史与边疆经略、日常社会秩序等议题相互连接,彼此关照。但这一研究亦还只是刚刚起步,其成果综合性程度还是非常有限,只是将交通史与政治史相结合。本书内各专题对宋代交通、政治多有兼涉,故拟书名为《宋代的交通与政治》。

目 录

自 序	1
交通史料与研究回顾	
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	3
略谈《参天台五台山记》的史料价值	10
地方志与域外汉籍:揭开宋代驿传制度奥秘的钥匙	
——兼谈正史、政书、类书等文献对宋代典章制度记载之局限性	22
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之回顾与展望	
——以唐宋道路和驿传问题研究为中心	40
地理形势与交通路线	
唐宋中国交通中心之南移及其影响	
——对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南北差距之形成且恒久未变之	
原因的一种解释	61
官路、私路与驿路、县路	
——宋代州(府)县城周围道路格局新探	89

南宋定都临安府对严州之影响·····	113
宋代西南地区交通述略·····	140
宋境通西夏道路新考·····	162

驿传设置与文书传递

南宋临安府周围之邮传系统

——立足于具体背景和设置状况的考察·····	179
------------------------	-----

威权、速度与军政绩效

——宋代金字牌递新探·····	206
-----------------	-----

两宋朝廷与岭南之间的文书传递·····	242
---------------------	-----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266
---------------------	-----

对外交往与交通行政

余靖出使契丹与蕃语诗致祸考议

——兼说北宋仁宗朝廷对契丹之态度·····	301
-----------------------	-----

北宋熙宁间地方行政一瞥

——以杭、台二州对日僧成寻之接待为中心的考察·····	323
-----------------------------	-----

北宋熙宁内诸司及其行政秩序

——以参与接待成寻的御药院和客省为中心之考察·····	348
-----------------------------	-----

宋朝对外国使客之接待制度

——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368
-------------------------	-----

大理国使入宋问题新探

——关于熙宁九年后大理贡使“不常来”及政和入宋路线变化 原因之考察·····	391
---	-----

宋朝限定沿海发舶港口问题新探·····	413
---------------------	-----

海外贸易与宋代广州城市文化·····	432
--------------------	-----

后 记·····	451
----------	-----

交通史料与研究回顾

宋代交通史研究资料概说

中国古代“交通”一词之涵义，与今日所言“交通”不同。古代之“交通”多用为动词，指“交往”、“结交”之意；今日之“交通”主要用作名词，其涵义有狭、广之分，狭义之交通(traffic)主要指人员、劳动产品之移动与相关设施及保障制度，广义之交通(communication)则包含通讯及相关内容。今日所言之古代交通史，多取“交通”之广义，主要研究并叙述古代人员往来、物资运输和信息传递之历史，宋代为中国古代之一阶段，其交通史之内容自然亦不外乎此范围。

因古今“交通”涵义不同，故古人在记述前代或当朝历史时没有“交通”一目，又加古人对今日交通涵义下内容之认识，亦与今人有异，故古籍中亦不可能有今日交通涵义下内容之专篇。但交通是人类社会生活之重要组成部分，故史书对其内容记载亦不可免，只是在具体记述中多依时人之习惯，或分门别类，或各有侧重，或详或略，或多或少，或记入地理门，或载于典章类。又，交通一事，上关国家政治、经济与军事，下涉百姓之生活，故无论士夫诗文丹青，还是民间百科卷册，皆有相关之内容，亦是异乎

详略多少之间。因此,古代交通史之资料虽不够完备,却可称丰富,但又十分零散。如宋代交通史研究著作中,无论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图地志研究》^①、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②,抑或是拙著《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③、《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④,征引文献皆在一、二百种以上,遍涉经史子集,旁及碑刻文物。尽管如此,皆不可言将宋代交通之史料搜罗殆尽,何况现有成果皆非全面而详尽研究宋代交通史之作。

宋代交通史料虽较零散,但若论具体之典籍,则亦不乏记载相对集中者。此类文献首推地志,其次为政书、游记、法典之属。

地志是以行政单位为范围,分门别类记载全国或某一地区历史、地理等内容之综合典籍。中国地志历史悠久,地域广泛,内容丰富,为世界所仅有。方志之书,起源于周,经汉、晋、隋、唐之发展,至宋代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隋唐以前,则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其门类亦不过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数种而已。”^⑤宋代地志分为总志和州、县、镇志,其编修事宜倍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宋代沿袭唐代三年一造图经之制度,“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之因,州为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⑥。然后朝廷再将图经编成总集,乐史《太平寰宇记》、王存《元丰九域志》便是如此而成。至于州、县、镇志,多是请熟悉地方掌故并有志于此道之学者执笔。宋室南渡之后,朝廷虽不再编修总志,但地方政府重视修志已蔚为风气。地方官皆以修志为任,虽“僻陋之邦,偏小之邑,亦必有记录焉”^⑦。由此可见,宋代地志内容不唯丰富,而且较

① [日]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图地志研究》,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

② 赵效宣:《宋代驿站制度》,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

③ 曹家齐:《宋代交通管理制度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

④ 曹家齐:《唐宋时期南方地区交通研究》,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⑤ 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2。

⑥ (元)脱脱:《宋史》卷一六三《职官三·职方郎中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1985,页3856。

⑦ (宋)赵与泌,黄岩孙跋:《仙溪志》,《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页438。

为可靠。

宋代地志中有关交通之记载，莫过于一州、县之“四至八到”。现存宋代地志中，除《輿地广记》、《輿地纪胜》、《方輿胜览》、《吴郡志》等少数以外，其余均记及一州或一县至周围各州县之里程，或称曰“四至八到”，如《太平寰宇记》；或称曰“地里”，如《元丰九域志》；或称曰“道里”，如《云间志》；或称曰“境土”，如《宝庆四明志》等。因这些内容称“四至八到”者居多，故可统称为“四至八到”。据笔者考证，诸志中所记“四至八到”即为州县与周围地区实际交通路线之里程^①。从此内容，可知有宋一代全国交通网络之状，及一州一县与临近地区是否有道路相通，道路之分布、走向与里程。因此，该内容堪称研究宋代交通史最基本之史料。但此内容亦有一定之问题，详考现存各地志之“四至八到”，相邻州县道路里程多有不相吻合者，其中以《元丰九域志》为甚。甲州和乙州彼此之间交通线，或方向不一致，或里程有悬殊。此应与地方州县各自编修图经有关。无论“地里”还是“四至八到”，皆不可能囊括一州县之所有交通线，州县草拟本地情况时，多是各自为之，未能与相邻州县互相协调，故所记路线、方向互有不同，对道里之推算亦大有出入。而总志编修者碍于材料浩繁，无法一一核实，故只能据现有材料连缀成书。因地志中“四至八到”存此问题，故据以绘制交通路线图则有失准确。

地志中关于驿传内容之记载同样是研究宋代交通史之重要史料。此类史料主要见于地方志，特别是南宋时修撰之地方志。如《淳熙三山志》地理类有《驿铺》一目，《景定建康志》疆域志有《铺驿》一目，《嘉定赤城志》地里门有《馆驿》一目，《宝庆四明志》叙郡篇有《驿铺》一目，《嘉泰会稽志》有《邮置》之目等，或叙及一州驿路之格局，或记述一州驿铺名称与分布，实乃关于宋代驿传不可多得之史料。其中不少内容皆是他书所无，如《淳熙三山志》对州城驿路上驿、铺布局及递铺内部结构之记载，乃宋人著述

^① 参见拙文：《唐宋地志所记“四至八到”为道路里程考证》，《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4期。

中绝无仅有之内容，弥足珍贵。

另外，宋代地志中有关州县沿革、山川、景物、古迹、风俗形胜等记载，间或提及道路里程、水道航运、交通形势等内容，亦为研究交通史之重要参考。又不少地志载有地图，亦可供参用，但古代地图既不讲比例，又无精确可言，使用时须多加斟酌。

宋代地志虽为研究交通史最基本之史料，却是甚不完备。宋人所修地志虽可知有六百多种^①，但仅有三十六种存留今日。其中总志五种，州县镇志三十一一种（含抄本二种），而三十一一种州县镇志中，二十七种皆为东南区域地志，其余四种则是宋敏求之《长安志》、《河南志》、程大昌之《雍录》和缺名之《寿昌乘》，分别记述长安、洛阳和湖北鄂城事。可以说，江西、两广、四川、两湖及广大之北方，绝大多数地区没有留下当时之地志，但也许上述地区明清方志中存有部分宋代史料，只是须在使用时认真区分鉴别。

地志之外，其他地理类杂志中亦不乏交通史之重要资料。其中尤以赵汝适《诸蕃志》、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等书为重要，对研究宋代南部边地及与外部之交通甚为有用。

对宋代交通记载内容之多，仅次于地志者，便是《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会要》）。今存《会要》虽为辑本，却仍具八百万言之规模，于宋代史籍内容最称丰富。其中涉及交通内容较多者，则有方域、食货、兵、职官、蕃夷诸类。方域一类，记载宋代交通最多，其《道路》之门^②，汇集道路修治之诏令与奏议；《驿传杂录》之门，专言馆驿之建造、使用，并兼及个别路段之驿程；《急递铺》门内容最多，载有太祖至宁宗朝有关递铺建置、管理及文书传递之法令与奏议；《关》与《关杂录》则记关隘之设置及其禁防。

① 此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

② 按：今日所见《宋会要辑稿》之类名和次序，是清人徐松整理时按《玉海》所载《五朝会要》二十一类名称和次序初步划分与安排。至于类下各种标目，情况相当复杂，或为《永乐大典》之事目，或为《宋会要》之门名，或为后来整理者所加，今统一称作“门名”。

其余如《四方津渡》、《桥梁》、《河锁》、《江锁》、《城门锁》、《治河》、《诸河》、《运河》诸门，皆属重点记述交通之资料；而《水利》、《市镇》、《诸寨》、《诸城山界》、《东京杂录》、《西京杂录》、《堡寨城垒杂录》等门，亦多涉交通之事。

食货一类，虽为财政、经济之内容，但与交通关系甚密。其中《漕运》、《水运》、《陆运》、《转运》、《纲运设官》、《纲运令格》诸门，记载官方物资运输之主要路线、运输形式、组织体制、管理条例、官员差遣、运输诸环节及相关诸问题，内容非常丰富，为研究宋代物资运输者所必据，堪称宋代交通史资料一渊藪。其余如《船》、《盐法》、《盐法杂录》、《茶法杂录》、《水闸》、《堤岸》、《水利》诸门，亦与交通多有关涉。

兵类虽主记军事，但亦兼及交通。其《马政》、《买马》、《川马纲》、《马政杂录》诸门，多涉与沿边部族之交通内容与马纲之路线选择及水陆路建设情况，亦包含许多交通史之资料。

职官类虽主要记载官僚机构之设置、沿革、执掌、编制、差官等情况，但亦不乏与交通相关之内容。如《通进司》、《银台司》、《进奏院》等门，则记述中央文书收发传递之制度；《河渠司》、《疏浚黄河司》、《四排岸司》、《下卸司》之门，则事关漕运路线之修护及漕运之管理；《发运司》、《催纲司》、《转运使》诸门，则记漕运组织和管理之机构；《市舶司》门，对各港口市舶机构之设置及相关条例，有较为详细之记载，甚关海上交通与对外交通之内容。

蕃夷类主要记载宋朝与周边政权、少数民族、海外诸国之使节往还、贡赐贸易等内容，对缘边交通、海上交通、对外交通等史实多有涉及。

《会要》虽含丰富之交通史料，但毕竟是辑录残本，许多内容已经佚去，故各门记载皆不完备。如《道路》、《驿传杂录》诸门，为交通最基本之内容，不唯参差不齐，而且多有残佚。

与《会要》内容相类者，有《宋史》诸志、《文献通考》，及《玉海》、《山堂考索》等类书之相关记载，其中不少内容亦关交通，可与《会要》相互参证，但数量不及《会要》远甚。